

美国亚太政策新动向

倪 峰

[内容提要] 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伊始，基于绩效评估、形势判断以及外交团队调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总体保持连续性的同时，出现了六个方面的微调，分别是对“再平衡战略”的全球再平衡、对华政策再平衡、亚太区域内再平衡、热点问题再平衡、功能领域再平衡和实施手段再平衡。对这些变化加以关注，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和认识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的亚太政策，进而因势利导，争取更多的战略主动。

“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推出的重大对外战略举措之一。尽管在提法上美国政府几经变更，从“重返亚洲”到“转身亚太”再到目前的“战略再平衡”，但其核心含义始终如一，即：在国际力量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因遭受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重创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下，将相对有限的资源集中投放在对美国未来发展最为重要的亚太地区，维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分享该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红利，应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

从美国全球战略的发展过程来看，重视亚洲并不是从奥巴马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亚洲拥有众多基地和大量驻军，并建立了以美日、美韩、美澳同盟为核心的双边同盟体系。冷战结束后，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的历届美国总统也未忽略过亚太地区。此次“战略再平衡”与以往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在于：首先，亚洲政策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权重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成为其主攻方向。其次，此次所谓“战略再平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全面铺开，齐头并进。第三，在“战略再平衡”过程中，美国不仅充分挖掘它在这一地区的“存量”资源，如加强与传统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关系，而且还在扩大“增量”方面做足了功夫。这其中包括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以及推动美国-缅甸关系实现突破。第四，在实力相对不济的情况下，美国充分地施展所谓的“巧实力”，在手段上推陈出新，其中包括充分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介入争端，把水搅浑。

美国采取的所有这一系列举动正在持续发酵，欣欣向荣、繁荣发展的亚太地区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纷争所困扰。由于该地区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抱有矛盾的心态，即一方面希望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因此，面对美国的“重返”，它们表现得跃跃欲试，试图搭上这趟便车牵制中国，同时为自己谋取私利。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的尘封已久的矛盾和问题正在不断被点燃、激化。正如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罗伯特·罗斯(Robert S. Ross)所指出的那样：“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并没有促成亚洲稳定。正相反，这个战略使该地区更加紧张，更易产生冲突。军用飞机和海军舰艇现在充斥着亚太地区的空域和海域。美国则承担着为这些在战略上和经济上均无关紧要的小岛而卷入冲突的风险。”尽管这位学者的观点在美国社会并非主流，但他却深刻揭示了美国相关政策的内在风险。

奥巴马在2012年的美国大选中连选连任，人们由此普遍预期，未来美国亚太战略的基本发展趋势是连续性大于变化。然而，从奥巴马连任以来的一系列人事调整、外交行动和政策宣示来看，“再平衡战略”在整体上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综合来看，我们可以把这些变化归纳为对“再平衡战略”的六点再平衡。

首先，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全球层面的再平衡。我们知道，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其利益分布于世界各地，而在其战略布局中，亚太、欧洲和中东三大地区最为关键。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呈现出“三级跳式”的东转态势：上世纪90年代，其战略重心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21世纪头10年，借九一一事件顺势转向西亚和北非地区；奥巴马上台后，又开始转向亚太。与此同时，无论在欧洲还是中东，美国仍有无法割舍的重大战略利益和需要处理的紧迫问题。美国与欧洲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血缘关联，它在这一地区拥有众多的传统盟友。中东则地处战略要津且是世界能源中心，同时面临着一系列棘手的矛盾和冲突，如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内战、巴以冲突问题、阿富汗问题等等。因此，美国内部和美国在这两个地区的传统盟友都对美国掉头东顾的战略发出抱怨之声。德国前外长菲舍尔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世界秩序正在重新排定座位，西方统治的200年走到了尽头，特别是欧洲就像缺了电的房子。当美国不得不为自己考虑，把战略重点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时，欧洲是如此的孤独和寒冷。”

因此，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伊始，美国对外政策的全球布局出现了一些调整。新任国务卿克里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把出访的首站选在亚太国家，而是选择了欧洲和中东。从2013年2月26日开始，克里用11天的时间访问了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埃及、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克里访德期间表示，美欧之间应尽早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这是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以来推出的最具全球影响力的重大举措。对此，欧洲响起一片欢呼之声，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

就称赞克里发出了“重要的跨大西洋信号”。此外，克里还在上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五次出访中东。奥巴马也将他第二任期的首访放在了中东。他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推出了推动巴以和谈的新举动，并就伊核问题与各方协调立场。奥巴马和克里的这些举动表明，美国不想在这些地区隐身或淡出，并正在以一种更巧妙的方式完善布局，以应对错综复杂的挑战。

2013年6月，奥巴马出访欧洲并出席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6月17日，奥巴马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会上共同宣布，美国和欧盟将正式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由于美欧经济总量约占全球一半，这项协定若达成，将会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预计将分别为美国和欧盟带来950亿欧元和1190亿欧元的贸易收入。

目前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不佳，军费面临大幅消减，维护全球霸权面临着资源瓶颈。美国不时地回头西望，必然会对战略东移产生牵扯。

其次，是对华政策的再平衡。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关注点。自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对美国长期奉行的“接触”政策做出许多重大修正，明显地加大了对华施压和防范的力度。在双边关系领域，美国两度大规模对台军售，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增加施压力度，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多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在中国周边，美国加紧投棋布子，巩固老盟友，拉拢新伙伴，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两国间的矛盾、摩擦呈高发、频发态势，战略互疑加重，竞争性明显上升。美国的举动既毒化了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增加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对于这样的后果，美国内部近期有一些反思。2013年1月17日，美国头号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名为《大赌注与黑天鹅》的报告，旨在为奥巴马新任期的外交政策建言。其中，前白宫亚洲政策高级主任李侃如以致奥巴马总统备忘录的形式，建议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微调。他认为，“再平衡战略”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糟糕的安全结果”，建议奥巴马尽早同习近平建立稳固的私人关系，并采取主动措施巩固和加强中美关系，“把中国拉回来”。

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再平衡已初现端倪。2013年1月24日，现任国务卿克里在美国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他上任后希望增加朝向北京的“再平衡”，“因为加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他认为，美国和中国虽然是经济上的竞争者，但是两国并不是敌手。克里同时还谈及了他对“亚太再平衡”政策的看法，认为目前增加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并非至关重要”，如果出任国务卿，他将更加深入地考虑这一问题，并尝试在此问题上采取考虑更周到的方式。3月11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发表了有关美国亚太政策的演讲，其中他将“美国继续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列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五大支柱之一。他指出，奥巴马总统赋予了中美关系极大的重要性，因为他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中美两

国之间广泛的、富有成果的和建设性的关系，就几乎不可能应对世界上的外交、经济和安全挑战。”多尼隆表示，他不希望将美中关系定性为“竞争与对抗”的关系，不认同一些历史学家抛出的所谓“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将陷入纷争”的言论，强调建立更加积极的双边关系是美中双方领导人的共同目标。克里首次访华期间也曾表示，世界正在经历重大变化，美方将站在战略的高度，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来定位美中关系；美方愿同中方一道，按照两国元首的要求，加强高层交往，加强对话、互信、合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注入强大生命力。4月15日，克里在东京工业大学发表演讲，推出了所谓的“太平洋之梦”，认为太平洋地区要实现“坚强增长、公平增长、巧妙增长和公正增长”，而在每一项努力中，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伙伴。他还对现场的日本听众明白无误地表示：“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与中国建立了层级史无前例的高层对话，我相信这是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我们清楚我们之间的分歧——今后也会有分歧，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种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使我们彼此尊重，一起合作。”

2013年6月7日和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成功举行了“庄园会晤”。不拘一格的外交安排、地点的选择、会谈的方式以及奥巴马向习近平赠送的红衫木座椅，都让人联想起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破冰之旅。习近平在访问中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历史联系。他说，40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以战略家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而如今两国则需要相互尊重，创新思维，积极行动，努力推进“跨越太平洋的合作”。通过在加州“阳光之乡”八个多小时的亲密互动，中美领导人就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谋划了未来数年中美关系发展的路线图，并在当下面临的诸多双边、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进行了“对表”。

总之，自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关系开局不错。通过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当前中美关系的氛围与奥巴马第一任期中、后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尤其是习奥会的会晤成果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清晰地向世界表明，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美两国已然意识到，中美相向而行才不会错过对方，应对共同挑战的最好方式就是合作塑造未来。

第三，是在亚太区域内的再平衡。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区域分布上的特点是，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方向上齐头并进。在东北亚方向，美国主要以加强美日、美韩等传统盟友关系为核心。在东南亚方向，美国则以扩充新伙伴为中心，其中包括全面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实现美缅关系的突破，鼓励印度向东看。从实施的效果来看，随着美日、美韩同盟的加强，美国已经在东北亚方向形成了一个对自己十分有利的地缘战略结构，继续扩大战果的余地不大；而在东南亚方向，美国还有进一步扩大影响的巨大空间。正如美国“再平衡战

略”的主要设计师、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指出的那样，在行动上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系在一起，是美国战略思考面临的下一个“挑战”。

奥巴马连选连任后，从高官密集出访的地域来看，无论是奥巴马对缅甸的历史性访问，还是克林顿国务卿和帕内塔防长联袂出访澳大利亚，所访问的地点都耐人寻味，因为缅甸和澳大利亚都是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关键国家。2013年3月，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洛克利尔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开始用一个地缘政治新词定义传统的亚太地区，即所谓的“印太地区”或“印太亚洲”（Indo Asia Pacific）。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是美国和美军制定其亚洲政策的最重要的职能部门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政策执行者，其所辖的区域几十年来一直被称为“亚太地区”。美国军方向来以固守传统而著称，此次洛克利尔忽然抛出一个新词来给亚太地区更名，其中显然包含了明显的政策指向。6月，美国新任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参议院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也指出，他上任后将推进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会做出两点调整，即进行“再再平衡”（rebalance within rebalance）和推动战略多元化。他指出，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东北亚受到极大关注，但他认为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更值得美国加大接触和介入的力度，即进行“再再平衡”。所有这些都昭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一步的重点，即美国在亚太地区将更多地调头南下和西进。

第四，在东北亚地区，美国试图在处理两大热点问题之间寻求再平衡。正当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布局南下和西进之时，两个热点问题的先后爆发将美国相当一部分关注点重新拉回到东北亚地区。这就是2012年9月爆发的愈演愈烈的钓鱼岛争端以及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

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即将结束和新任期即将开始之际，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急剧升温曾是美国在东北亚方向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面对这一争端，美国一方面表示不在主权归属问题上采取任何立场，并先后派国防部长帕内塔和前政要代表团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防止中日矛盾的不断升级最终将美国卷入冲突；另一方面，美国不断释放出偏袒日本的言行，美日两国军队多次举行针对钓鱼岛的联合军事演习，克林顿国务卿也多次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特别是在2013年1月18日举行的美日外交会谈中，她声称美方承认钓鱼岛在日本的管辖之下，反对任何单方面破坏日本管辖权的行为。这一表态表明，美国对日本的偏袒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美国的偏袒助长了日本与中国对抗的底气。日本首相安倍不断放出狠话，称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绝不会让步，也不会让钓鱼岛成为谈判对象”。他在首次出访东南亚时公开声言欲打造围堵中国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增加军费以对付中国。他还写信给北约秘书长，要求联合对抗中国的“海洋崛起”。

2013年2月12日，就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陷入胶着之际，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此举震惊世界，令东北亚安全局势受到强烈冲击。韩国国内的拥核声音迅速高

涨；日本在议论军事“先发制人”；朝鲜半岛风声鹤唳，朝鲜与美韩的军事对峙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如何应对朝鲜半岛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顿时成为东北亚地区各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开始试图为钓鱼岛问题降温。2月22日，安倍出访美国。日本方面本想利用这次访问，期待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进一步为日本撑腰，然而美方对此却刻意保持低调。奥巴马在记者会上只是简单提了一句“美日同盟重要”，之后就把话题转到了经济上面，只字没提钓鱼岛，也没提《美日安保条约》。而多尼隆3月11日在亚洲协会上的讲话更加清晰地排列出了美国处理这两个热点问题的优先次序，用七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辟出一章来谈论朝鲜问题。至于钓鱼岛问题，多尼隆仅以“东中国海领土纠纷”的提法在一个自然段中有所涉及。4月12日至15日，新任国务卿克里展开了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国务卿首访的中心工作是与相关国家建立正常的工作关系，而由于朝鲜半岛形势紧张，朝核问题一直是此次访问贯穿始终的核心话题。

第五，是对“亚太再平衡”的三大功能领域实施再平衡。在奥巴马第一任期“重返”亚洲的过程中，尽管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三个方面全面铺开，齐头并进，但从效果上来看，军事和外交上的效果比较明显，经济上是主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但成果有限。所以，经济问题成了“再平衡战略”中一个相对的短板。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有可能在亚太战略中更加突出经济元素。因为外交服从于内政，当下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来自内部，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高企等经济问题严重困扰着美国，民众普遍对现状不满，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正如国务卿克里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讲中所言：除非我们在国内强大，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世界上强大；奥巴马政府的施政重点是经济，即消赤字，减失业，谋转型，其对外战略将更为突出地为推动经济复苏服务，为重塑美国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创造条件。2012年11月17日，克林顿国务卿也曾在于新加坡发表的演说中称：我们正在调整我们的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将体现“经济主导”的一面，因为“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有赖于我们的经济实力”。

如果经济因素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分量上升，那么它将有可能相对淡化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亚太政策中过于浓重的军事和政治色彩，从而为各种地区纷争降温，缓解亚太地区不断上升的安全困境，创造出相对宽松的环境。

第六，是实施手段的再平衡。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最重要的抓手之一。通过这种简便的手段，美国成功地离间了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成本极低，收益很高。然而，随着2012年黄岩岛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相继出现，这种手法对美国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其中，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持续升级尤其超出了美国方面的预料。2012年10月20日，奥巴马政府匆忙派出四名前

高官出访中日两国，试图为不断升级的争端降温。在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闹得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国内开始出现要求美国政府保持谨慎的声音。美国凯托学会负责国防和对外政策研究的副会长特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在《国家利益》2012年10月1日号发文认为，钓鱼岛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个“潜在危险”，奥巴马应该驳回美国国务院对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的诠释，向东京明确表示“不管过去几十年来华盛顿对该问题采取什么立场，现如今美国都不会因为一些无人居住的岛礁而冒险开战。对美国而言，在危机真正爆发前表明这一立场很重要”。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也在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美国为保卫朋友和盟友的小岛礁之荣耀而走向战争，绝对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总之，随着东亚地区领土争端的不断升级，美国战略界日益清楚地意识到，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并采取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立场，不仅向有关国家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而且还大大增加了将美国自身卷入冲突的风险，最终将伤及自身。介入政策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而风险和成本正大幅度上升。

因此，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内推行“再平衡战略”时，有可能在介入争端的问题上采取相对谨慎的立场。例如，在安倍访美期间，奥巴马非但没有重申希拉里·克林顿的表态，甚至在公开场合没有提及钓鱼岛问题，只是重申日本是美国最密切的盟友，美日同盟是亚太安全的基础。新任国务卿克里当天也不像他上任之初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通话时那样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而是对钓鱼岛争端轻描淡写。

前一阶段，国内学界对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亚太战略走向的预测主要是强调其连续性的一面，这对于认清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实质和基本走向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对可能发生的变化似乎重视不够。而从目前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些行动和政策宣示来看，美国的亚太战略的确在发生一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动的幅度大于多数人的预期。对于这些变化加以关注，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和认识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美国亚太政策，并因势利导，争取更多的战略主动。

(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

洪 源

[内容提要] 中日钓鱼岛争端的起因是冷战时期美日两国对钓鱼岛的私相授受。这种私相授受是完全违反国际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的。在日本挑起钓鱼岛之争后，美国出于重返亚太、战略“再平衡”的需要，利用日本来遏制中国的发展，默许日本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成果的非法行为，在中国对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情况下，不仅有意采取模棱两可的模糊政策，而且加强了日美在该地区的安保政策和军事力量。美国挑动中日相争、将日本祸水西引、养虎遗患的做法会被日本涌动的右翼势力反向利用，成为 1938 年的《慕尼黑协定》将纳粹德国祸水东引的东亚翻版。最终，美国只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西南防卫区加强军事部署成为日本极力推进的重要对外战略。在《2011—2015 年度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中，日本更是强调要加强海岛防御和西南防卫，增强美日夺岛演习，不断强化安全防卫中的美国因素。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和日本的海洋争议问题变得比较突出。继钓鱼岛撞船事件和石原慎太郎挑起的所谓“购岛”事件引发中日钓鱼岛领土之争后，美国一方面表示拒绝涉入钓鱼岛主权之争，一方面又三番五次地表态称，鉴于《美日安保条约》，虽然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之争不会选边站，但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现实行政管辖权，并且在日本西南海域开始加强美日安保防卫。也就是说，自“购岛”事件发生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逐渐改变了以往比较模糊的政策，以相对而言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到了中日领土争端中。这充分暴露出美国在“二战”后国际法律体系问题上的虚伪性以及在中日关系上的两面性。

钓鱼岛危机概述

钓鱼岛危机，主要起因于 2012 年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倡议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并将其“国有化”的动议。

自古以来，钓鱼诸岛及其周边海域就是中国人祖祖辈辈捕鱼、采药、避风和休息的场所，并受到中国政府的行政管辖。直到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才将台湾、澎湖、钓鱼岛等中国领土非法占据。1943 年 12 月 1 日，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激烈阶段，中国、美国、英国在《开罗宣言》中宣告了日本非法占据中国领土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1945 年 7 月 26 日，美、中（蒋介石未出席，后签字）、英三国首脑签署《波茨坦宣言》（即《波茨坦公告》），宣言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奠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国际法律基础文件。它将战败国日本的版图不仅推回到“二战”以前，而且推回到甲午战争以前，使日本领土仅限于上述四岛。至于四岛之外的其他小岛是否属于日本主权所有，则由三国一起来决定。这两份纲领性文件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日本主权已经不涉及钓鱼诸岛及其周边海域，即便行政管辖权，日本也无权染指。钓鱼岛与琉球列岛被纳入了联合国的发起国、日本的占领国——美国的托管权限内。这是非常重要的史实。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亟需利用日本在东亚地区充当反共帮手。1951 年 9 月 8 日，“二战”的 48 个战胜国与战败国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亦称《对日和约》）。其中第二条“领土放弃”写明，“日本放弃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相关之所有权利、名器与请求权，同时接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 1947 年 4 月 2 日所采取有关日本前述太平洋岛屿委任统治地之信托统治安排”。也就是说，日本在国际法概念上同意并承认美国对位于日本西南方向的诸岛代表联合国实施托管。同日，仅仅在《旧金山和约》签订五个小时之后，美国与日本在旧金山火速签订了《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安全保障条约》（Treaty of Security and Safeguard Between Japan and United States，即《美日安保条约》），其中的第五条“共同防卫”条目标称，“各缔约国宣誓在日本国施政的领域下，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

当时，钓鱼诸岛还处于美国托管之下，并不属于“日本国施政的领域”范畴，根本不存在受该条约保护之理。1961，《美日安保条约》经过一次修订。1970 年，美日商谈后宣布，该条约的有效期限被无限期延长。1971 年，美日缔结归还冲绳的协定，即《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竟然将钓鱼诸岛与冲绳一起移交给日本政府进行行政管辖。从此以后，美日双方均宣布钓鱼诸岛在《美日安保条约》的

保障范围以内。由此可见，仅仅由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缘故，钓鱼诸岛才成为美日共同保障的范围，而《美日安保条约》之所以能够适用于钓鱼诸岛，其法律依据也只是美日缔结的归还冲绳的协定。然而，“二战”后的法律框架文件《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只有在中、美、英三国都同意的前提下，除日本四岛之外的任何小岛才能归于日本的主权管理之下。这一法律规定实际上为中、美、英三国设定了一个共同同意的义务。美国在明明知道中、日两国对钓鱼诸岛存在重大领土争议的情况下，未经中国同意而将钓鱼诸岛的管辖权划归作为争议一方的战败国日本。这种私相授受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等法律文件所确定的战后雅尔塔国际和平体系的基本精神，更是对反法西斯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国家和美军将士的背叛。

美国不仅有意为之，更是心知肚明。非法“转让”钓鱼岛托管权之后，1975年4月3日，美国国务院在一封就美国海湾石油公司准备在钓鱼岛海域钻井一事回复美国驻日使馆的电报中称，美国政府强烈建议美国的石油公司不要在钓鱼岛争端海域进行勘探或开采，美国政府并不认同钓鱼岛的主权就是日本的，而是认为钓鱼岛的主权存在争议。然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文特雷尔却于2012年7月11日称，虽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采取立场，但钓鱼岛在1972年作为冲绳县的一部分归还日本后，一直在日本的行政控制之下，因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2001年12月12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福特曾宣称：“钓鱼岛一旦受到攻击，美国有可能对日本提供支持”。2004年2月2日，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访问日本时宣称：“施政权所涉及的范围都适用于安保条约，在《美日安保条约》中，日本施政下的领域一旦受到攻击，那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攻击。”2004年2月5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宣称：“在《美日安保条约》中，美国已承诺对日本予以保护。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的领土，保护日本也包括保护‘尖阁列岛’。”2004年3月23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艾利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2009年2月26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称，日本将同美国协商，将钓鱼岛问题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框架内。2009年3月2日，美国重申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覆盖范围，而且美国保留对该岛主权的最终裁判权。

2010年1月12日，美国时任国务卿克林顿发表讲话，表示美国已经开始重返亚洲。她强调美国不仅仅是重返，而且还要在亚洲留下来。而美国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真正原因，是遏阻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影响力的扩大。目前，中国拟建设包括韩国、日本和东盟十国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而美国推进的TPP正与此形成对攻态势。美国重返亚洲的安全战略

核心目标是:保持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能力,改善安全,扩大繁荣,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下来,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不受到中国的挑战。为此,美国采取的手段是高调介入南海各国和日本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以牵制中国海上力量的迅速发展。

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转变,始于2010年9月23日克林顿国务卿在纽约对日本时任外相前原诚司的明确表态:钓鱼岛处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覆盖范围之内。2010年9月7日,中国福建籍渔船“闽晋渔5179号”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发生碰撞。之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立即发生了明显变化。2010年10月28日,克林顿国务卿在夏威夷会见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时指出:“我愿明确重申,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我们重视保护日本国民的义务。”2010年10月30日,她在谈到钓鱼岛时又说:“美国对于(钓鱼岛)主权从来没有采取预设立场,但是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白,这些岛屿属于我们共同的条约义务,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保卫日本”。

2012年7月24日,日本时任外相玄叶光一郎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声称,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我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之间也已确认过这一点”。他的言外之意是,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保护日本当然包括保护钓鱼岛。

2013年1月18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华盛顿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会谈后,在双方共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不准备退让并将维护我们的基本立场。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我们打算冷静应对以免激怒中国。日本非常重视美国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日本的郑重承诺,这是基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美国将反对任何单方面侵犯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行政管理权的行动。”

2013年4月14日,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出访东亚期间称,美国致力于保卫日本,反对中国采取胁迫行动夺取日本控制下的东海岛屿。美国在钓鱼岛争端中不持任何立场,钓鱼岛“处于日本的有效控制之下,(美国)对任何想要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表示反对。”

2013年4月2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东京指出:关于日本与中国的岛屿争端,“我重申我们的政策——这是你所非常熟悉的,包括我们对日本共同防御条约义务。”

2013年4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与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会谈后表示:“包括核保护伞在内,基于美国遏制力的日本防卫(政策)没有动摇。”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哈格尔辩称,美国对钓鱼岛主权的归属问题不持立场,但承认钓鱼岛处于日本管辖之下,而且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

美日在钓鱼岛的利益与战略边界

陆权国家突破海上霸权国家的围堵是个古老的命题。细究起来，“第一到第三岛链”概念的实质，是海洋霸权国家美国纠集其他大大小小的海洋国家对中俄两个欧亚大陆国家形成的“钻石形包围圈”。然而，技术进步使得包围与反包围的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突破第一岛链属于海空协同战役动作，除战役防空和空中遮断，还有战略弹道导弹的洲际威慑作用交叉配合，更有太空预警卫星、侦察卫星时刻监视海面，连通指挥和打击数据链。换句话说，海权国家享有上千年的海洋机动性和便利已被空中和太空时代的技术大大抵消。

鉴于此，美国自 2008 年以来对全球军事部署进行了重新调整，准备把海军 288 艘舰只的 60% 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同时还要加强对中国周边第一、第二岛链和关岛的军事配属，意图将中国牢牢地限制在第一岛链内。由于中国远程武器平台和打击兵器作战半径的增强，美国海空力量退而转向四千公里外的第二岛链封堵。实际上，第一岛链之内的区域已经成为海洋霸权与陆上霸权实力交错和拉锯的地带。换句话说，海洋霸权的优势在此区域内已经破产！“试看第一岛链内，竟是谁家天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所以，2010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要为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发展全新的作战理念，主要目标是应对来自西太平洋的中国等国家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方式。2011 年 8 月，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专门研究和负责“空海一体战”的办公室，作为实施“空海一体战”作战理念的各军兵种的联合指挥架构。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势单力孤，“空海一体战”也成为美国与西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的联合作战计划。美国指望依靠这种不是军事同盟的军事同盟克服所谓的“空间障碍”。其中的深层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崛起怀有深刻的防备心态，一直试图在空间上将中国牢牢禁锢在第一岛链之内。2011 年 11 月 16 日，奥巴马总统在堪培拉宣布了美国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规模 2500 人的海军陆战队（一个战斗群）的永久性驻军计划。就是落实“空海一体战”理论的一个重要步骤。美国在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阔海陆区域占有优势地位，可以用来对抗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在军事上限制中国远洋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航行自由，防止中国的海上力量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将中国武装力量围困在近海，从而消除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绝对海上霸权的挑战，并最终降低威胁到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

美国始终非常清楚中日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问题上存在领土争端，对中国方面的立场也十分清楚。但美国只在口头上尊重中国的立场，在实际行动中从未与中

国进行沟通协商，也从未顾及中方的一贯立场，非法将中国的领土钓鱼岛私相授受给日本，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随着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美国迫切需要日本在该地区防卫中国的问题上分担责任，所以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进一步介入钓鱼岛争端，希望以“模糊介入”中日钓鱼岛及周边海域争端为契机，顺利实施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并且使钓鱼岛问题更加复杂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当年曾在与土耳其及塞浦路斯官员对话时称，“违法的行动我们要赶快做，违宪的行动要耐心。”了解美国以往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连续性，有助于人们认清今天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之争中所使用的外交手段。美国不仅在该事件上呈现出积极介入的姿态，而且试图以此为契机，将中日两国玩弄于股掌之中，确保美国在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领域的主导权。美国政府秉承了一贯的违反国际法律体系的实用主义做法，中国对此不必感到丝毫奇怪与惊讶。

日本方面，2012年2月10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发表了《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1》，认为“与南海一样，东海也是中国进入海洋的重要通道。未来，中国在东海的军事力量相对提高后，在这一海域也开始采取强硬态度的可能性很高。今后，对不仅南海而且还有东海和太平洋等日本近海的中国军队的动向，也需要进一步加以关注。”日本政府天真地认为：将所谓“尖阁列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就能够使日本的非法抢占行为被赋予合法的色彩。2012年7月，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在日本国会答辩时说明，如果在包括所谓“尖阁列岛”在内的“领土领海”出现周边国家的非法行为，政府将毅然以对，包括根据需要动用自卫队。但是，《美日安保条约》对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适用根本没有国际法上的依据，因此是无效的，是野田内阁的一厢情愿。

从表面上看，《美日安保条约》对于钓鱼岛的归属认定与协防似乎是铁板一块，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即使美国一再声称，日美之间的共同价值观、民主理想、共同利益和尊重人权的法治体系是美日同盟的基础，但必须认清的是，美国和日本的本质关系不是盟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军事同盟，包括美日安保同盟，根本不是平等意义上的同盟关系。如果一定要定位的话，不如说是主仆关系更确切些。而且，日本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美军享有治外法权，不受日本司法管辖审判。美军实际享有的是占领军的地位。所以，日本何尝不想赶走美军，美国是日本人内心和事实上的敌对国家。而每年12月7日是美国的“全国珍珠港纪念日”，当日夏威夷州长要发表纪念讲话，并拿到美国国会审议通过。这反映出美国也很重视美日潜在的敌对关系。

美日两国私相授受钓鱼岛的做法，完全违背《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一整套法律文件所确定的战后雅尔塔国际体系和秩序。美国一旦把反法西斯战争打出来的成果毁掉，总有一天日本会反过来翻案，证明美国才是屠杀者，

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刽子手，报被美国扔原子弹的一箭之仇，然后进行战后总清算。大阪知事桥下撤曾称，已经订出时间表，要求（日本政府）在2040年赶走美军。最终，美国只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其次，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势头十分强劲，因此，美国重返亚洲、玩弄力量再平衡游戏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的经济和实力的迅速增长，加强对亚太伙伴国在经济、政治上的领导地位。美国充分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利用日本遏制中国的崛起，给中国制造麻烦。日本基本做到了，但在完成牵制中国的任务的同时，日本又趁机提出诸多“合理要求”进行“合理敲诈”。因此，美国要极力控制住日本的右转步伐。日本一旦拥有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军事实力，从理论上讲，它既可以打朝鲜、韩国，也可以打中国、俄罗斯，更可以打美国。美国在走钢丝，但这个钢丝可不是好走的，这其中隐藏着美国深深的无奈和悲哀：这哪里是曾几何时的超级大国？国家实力的衰落已经让美国无力支撑超级大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更无心无力去保卫一个只能利用不能共事的准敌国。美国只有两面讨好，两面看脸色，两面挑拨，玩起坐山观虎斗的把戏，最后的结果一定事与愿违，美国只会落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下场。

21世纪伊始，美国的制造业和金融业率先开始衰落。与此同时，日本与美国之间开始出现摩擦“三步曲”：首先，从首相小泉纯一郎时期开始，日本就确立了新的标准，即不仅要派遣自卫队到伊拉克，还要重新定义日本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总之，就是要找到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定位。美国也逐渐领悟到，日本在不断强烈要求美日同盟关系成长为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第二，在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要求收回普天间机场的美日角力中，日本告败。第三，钓鱼岛危机成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试金石，谁是主动方，谁是跟进者，谁指挥谁，谁最后得利，这些都是关键问题。钓鱼岛问题和普天间机场迁移问题一样，是日本在脱亚入欧后，试图脱欧入亚、摆脱美国的题材。日本试图将美军从普天间基地赶走；在钓鱼岛问题上则是挑起事端，逼美国在日本决策后被动跟进，由日本决策，美国执行，把美国调动起来“保卫日本”。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是日本梦寐以求的事情。实际上，这反映了日美间的矛盾。日美同盟中，美国一向以说一不二的盟主自居，日本则处于完全被动服从的地位。美国反复宣称是日本的坚定盟国，但又反复宣称在钓鱼岛问题上不选边站，承认日本的行政管辖权，却又不承认日本的主权。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在背叛，明显是在耍弄日本。美国要在此问题上让日本与中国鹬蚌相争，以便自己渔翁得利。日本政客看清了这一点，对美国是又恨又怕又依赖的矛盾心态。日本一直“忍辱负重”，欲借美国重返亚太和战略“再平衡”的机会重新进行政治布局，推动皇国势力再次崛起，在国内一举实行右倾排外政策，挣脱美国的军事束缚，最终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这是日本历史上惯用的伎俩。日美两国实际上正在进行“二

战”后的全面较量，最终结果要看美国政界能否识破日本的如意算盘。

钓鱼岛危机走向

日本挑起钓鱼岛主权之争，本质上是在“赌国运”。正如 2009 年的普天间基地搬迁事件一样，日本意图摆脱美国占领控制计划中的一枚不大不小的“打劫”棋子，然而一着不慎就会全盘皆输。美日双方谁都不能后退，只要一退，就是“兵败如山倒”。目前，日本决心利用中日钓鱼岛之争，趁美国因重返亚太需要日美安保遏制中国之机向美国要价，趁机全体右转和扩军，摆脱美国的控制，狐假虎威地将美国拉入中日争端，消耗掉中美的战略和战争资源，自己趁机坐大。这是一箭三雕的毒计。

目前，钓鱼岛危机导致日中双方的态度日趋强硬，互信越来越少。美国从中渔利、趁火打劫的空间也被挤压。从操作层面上来说，美国放日本出来，无论是收紧或放松，尺度都难以控制。一旦放“鬼”出魔瓶，就由不得美国的操控了。而得势的日本右翼势力则会玩弄一贯的“下克上”的把戏，不会听从首相的招呼。届时即使是激进的安倍政权，也会把握不住局面。加上中国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所以变量极多，谁都无法完全操控钓鱼岛纷争引起的后果。中日保持友好关系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如果这种关系不复存在，本地区将陷入充满紧张和冲突的不安定状态，未来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发展方向，也将变得非常难以预测。

（洪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气候变化问题在美国的安全化进程分析

赵行姝

[内容提要] 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由其所引发的国内国际冲突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的趋势不仅在学界日益明显，而且已受到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治理的承认和重视。目前，美国学术界和智库的相关研究为美国决策层采取行动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美国决策层内部的质疑以及美国民众的认识不足，导致美国国内气候问题的“安全化”进展仍然十分有限。

目前，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的趋势不仅在学界日益明显，而且已受到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治理的承认和重视。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也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的范畴，采取了多项政策或措施来应对气候安全问题。

全球环境安全研究简要回顾

对环境与国家安全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1977 年，世界观察研究所 (Worldwatch Institute) 的环保主义者莱斯特·布朗 (Lester Brown) 发表了论文《重新界定国家安全》(Re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指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安全威胁将会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安全威胁将来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强调，70 年代日益减少的石油储备和地球生物系统的恶化威胁着各国各地的安全。1983 年，理查德·厄尔曼 (Richard Ullman) 发表《重新界定安全》(Redefining Security) 一文，主张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威胁所包含的内容，认为除了传统的军事关切外，它还应包括如环境变化这样的内生性威胁。他写道，“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是一种行动或一系列事件，它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猛烈地降低一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或大大缩小一国政府、私人或非政府实体的可选政策范围。”

1987 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 开

启了官方使用“环境安全”术语的先河。1988年，世界观察研究所在其发布的《世界状况》(1988 State of the World)报告中指出，40年来，安全在很大程度上都以意识形态术语来定义，持续的环境恶化所造成的威胁已不再是一个假想问题，而“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现在更多地来自环境和经济的变化，来自政治问题的将很少”。冷战期间，侧重非核、非国家实体的战略性威胁并未受到广泛关注。环境安全理论发展的分水岭出现在1989至1991年。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大国间的战争已销声匿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种全球背景下，随着环境遭到破坏的科学证据逐渐增多，将环境恶化提升到国家安全威胁的高度和重新界定国家安全便成为新的潮流。

1989年，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 Institute)的杰西卡·珍妮·马修斯(Jessica Tuchman Mathews)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重新定义安全》(Redefining Security)一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将要求重新界定什么构成国家安全”。她认为，70年代的安全概念扩展到包含国际经济学，现在的全球发展则要求进一步扩展国家安全的定义，把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也纳入其中。尽管很难给出环境安全的精确定义，关于是否应将环境恶化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争论也从未间断，但是，以下四个因素可以说明安全与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环境变化之间的关联：第一，环境退化本身就是对人类安全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严重威胁。第二，环境退化或变化既可以是暴力冲突的原因，也可以是其后果。第三，预测和控制风险是军事安全关切的基本要素，二者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第四，对环境与安全之间的联系的认识已正式建立，且主流政治家们支持对环境负责的安全政策。

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后，布什政府雄心勃勃的全球反恐战略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美国将安全威胁进一步定义为攻击美国大陆以及任何促成这种后果的行为。在这种背景下，对环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探讨也随之升级。历史上，人们将环境问题与核威慑相提并论，九一一事件后，环境问题开始被置于恐怖主义的高度。2005年，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珍妮特·萨温(Janet Sawin)曾发表《气候变化比恐怖主义构成更大安全威胁》(Climate Change Poses Greater Security Threat than Terrorism)一文，指出气候变化会影响全球的水供应和农业活动，造成一些地区的干旱和饥荒，导致当地人寻求非法组织和恐怖主义集团的帮助，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气候安全进入全球治理的政治议程

环境问题“安全化”的趋势不仅在学界日益明显，而且已受到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治理的承认和重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在1994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最先提出并界定了“人的安全”的概念，将环境安全界定为人的安全的组成部分。该报告指出，“人的安全有两大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免受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性威胁的安全；其二是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对突如其来的伤害性骚扰的防范。”为避免“人的安全”的定义过于宽泛，该报告把“人的安全”的要素具体划分为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自联合国率先提出“人的安全”的定义后，学术界和政界迅速掀起了研究“人的安全”的浪潮，并提出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的侧重各有不同，但都是以联合国的定义为蓝本的。

此后，联合国不断从安全角度来考察环境问题，进一步将环境问题认定为国际安全的重大威胁。2004年，“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题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的报告，明确地将环境遭到破坏列为国际安全的重大威胁，指出“任何事件或进程，倘若造成大规模死亡或缩短生命机会，损害国家这个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单位的存在，那就是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根据这一定义，可将各种威胁归纳成六组：经济和社会威胁，包括贫穷、传染病及环境退化；国家间冲突；国内冲突，包括内战、种族灭绝和其他大规模暴行；核武器、放射性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目前和未来几十年中，全世界对这些威胁必须予以关注。”

与环境问题“安全化”一脉相承的，是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气候变化是否威胁到国家安全？是不是气候变化产生的所有问题都是气候安全问题？毫无疑问，气候变化对某些国家或社区而言的确是关乎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安全问题，比如沿海的小岛屿国家就不得不面对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会导致国土被海水淹没的危险。但是，以托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F. Homer-Dixon）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气候变化的后果被夸大了，全球变暖对国际安全问题不具有独立的重大影响。他认为，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只有在与其它社会、政治和环境变量共同作用的情况下，才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冲突。他强调，政治制度薄弱、不合法或有争议的政府、族裔群体关系等非环境变量，是环境稀缺性导致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发生冲突的必要因素。这也成为近10年来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共识。笔者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理论的探讨和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的政策实践。2007

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阿尔·戈尔（Al Gore）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同年，联合国安理会首次讨论气候变化问题。2007年4月17日，在英国的积极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就气候变化、能源和安全问题举行高级别辩论。此次辩论后，联合国公开强调气候变化影响国际安全，用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变化问题特使韩升洙的话说：“气候变化已经不仅仅是环境问题了，它是一个关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它也是国际安全问题。或者说，气候变化既是国内政治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全世界都应该对此给予关注”。

2009年6月3日，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举行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辩论。此次辩论是应太平洋地区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请求而举行的。大会讨论后达成了一项决议，呼吁联合国评估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安全影响。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清晰地将气候变化和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2011年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关于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的第二次辩论。此次辩论由德国发起，同时获得了葡萄牙的大力支持。德国呼吁联合国重点关注两个主要问题：其一，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对沿海和小岛屿国家的影响；其二，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其在此基础上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自“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问题进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治理的政治议程以来，各国决策层纷纷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这一问题，学术界也在不断深化对此问题的理解。这些变化为未来国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奠定了基础。

气候问题安全化在美国的科学议程

近年来，研究气候变化的安全含义的报告很多，其中引发巨大反响的要数2003年发布的《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An Abrupt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该报告研究了气候突变的可怕后果，强调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极微小的可能性，也应该将气候变化纳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切范畴，而不应该将气候变化仅仅限于科学讨论中。该报告由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主任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出面委托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artz）和道格·兰德尔（Doug Randall）完成。安德鲁·马歇尔曾为20世纪70年代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以来的历任国防部长效力，被誉为国防部的“智者”。报告发表后，他本人发表声明说：“在预测突变性全球变暖的影响时，（此报告）反映了科学模型和信息的局限性”，尽管得到“重要科学证据”的支撑，“研究所预测的很多内容仍然只是一种推断（speculation）”。最终，安德鲁·马歇尔并没有将报告提交给

国防部和白宫的上级领导。

《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的意义在于它突破缓慢变化的气候情景，转而聚焦于气候突变的情景，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此后，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开始从大气科学、农业水文学、能源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投入“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研究。美国很多知名的一流智库都参与其中，并发布了自己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和美国新安全中心（the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共同发布的《后果降临的年代：全球气候变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含义》、海军分析中心（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发布的《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发布的《2030年前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的《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一份行动纲领》。

多数研究使用“情景分析”的方法，在不同情景下考虑全球变暖将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然后在此基础上使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以往文明中各种自然现象（如洪水、地震、和疾病）对发生国的影响，以此来帮助理解尚未得到抑制的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美国，最后预测出上述影响对美国的和平与稳定可能产生的后果。譬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美国新安全中心的研究报告，就称历史上的灾难事件是“有启发性的”。该报告发现，在科威特、哥伦比亚、阿富汗和民主刚果共和国的战争中和安哥拉、塞拉利昂等地区的持续叛乱中，自然资源对引发冲突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多数研究认为，气候变化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前所未有。很多研究提醒人们，以往发生的灾害规模相对较小或分散在不同地区，在人类历史上，在不同地点同时爆发影响整个社会的全球性灾难，尚无先例。所以，很难用过去的历史来预测气候变化对未来的影响。如果不应对气候变化，它可能会对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带来重大挑战，这些挑战的严重性甚至远远超过以往任何问题的严重性。多数报告建议美国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即未得到抑制的气候变化将会使美国国家安全面临史上最大风险——甚至超过恐怖主义、流氓国家、中国的崛起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带来的风险。

目前尚无美国学界普遍接受的关于国家安全威胁的确切定义，有关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究一般把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分为以下两类：1. 直接的有形威胁：能够威胁美国本土或者美国在国外的关键资产和人员；2. 间接威胁：气候变化对某些国家或地区产生严重影响，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气候变化与美国利益》将这种间接威胁称为“溢出效应”（spill over），即气候

变化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影响最终会传导到美国。气候变化带来的间接安全问题是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重点。

现有研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气候变化本身不是国家安全威胁，但它却是“威胁放大器”(threat multiplier)——这一术语在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AN)发布的研究报告中首次出现。具体而言，气候变化的直接后果如果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因素(经济结构、教育水平、种族分裂、社会阶层分化、技术能力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等因素)相互作用，就会造成贫困(甚或经济崩溃)、群际紧张状态、人口迁移、制度崩溃等，从而威胁国家安全。总之，气候变化的影响将会使其他大多数安全威胁进一步复杂化。

美国的气候安全战略正在形成

政府决策机构对气候问题的表态和采取的行动，是气候问题安全化的关键步骤。气候变化进入美国的国家安全视野，可以追溯到199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表述为国家之间武装竞争争夺“逐渐减少的未受污染的资源”。但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气候安全根本未进入美国决策层的视野，甚至气候变化科学也一度遭到质疑。这种现象直到2008年才开始改变。

2008年1月颁布的《200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The FY2008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P.L. 110-181)要求未来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即2010年2月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探讨军方对气候变化后果做出反应的能力，特别是针对极端天气事件类自然灾害的防备情况，以及可能会要求军队在美国境内和海外支持的项目。具体来说，2008年1月后的美国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完成三方面的工作：其一，评估预期的气候变化对军队当前和今后的任务构成的风险；其二，基于这些评估更新防御计划，包括与盟国和伙伴合作的计划；其三，发展降低气候影响的能力。这些要求推动美国国防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

2010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气候变化的危险是真实、紧迫和严重的。一个正在变暖的星球所引发的变化，将导致难民的出现、资源的争夺、饥荒与旱灾和灾难性的自然疾病的出现，以及全球土壤的退化。”“气候变化和大范围的流行性疾病将威胁到地区安全以及美国人民的健康和人身安全。”“重点是加强国际制度和集体行动，以保护共同利益，包括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制止核武器的扩散并确保核材料安全，实现平衡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针对气候变化、武装冲突和流行性疾病的威胁，推动合作解决方案的出台。”“最近海地发生的毁灭性地震

再次警示我们，自然灾害可以带来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气候变化预示着未来美国必须准备好发挥其强有力的领导作用，以帮助解决重大的人道主义需求。”

2010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在本土和海外两个层面上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这是五角大楼第一次在综合规划中提及应对气候变化。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可能加重全球贫困，加剧环境恶化，进一步削弱已经十分脆弱的各国政府，而这些可能对全球的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气候变化会加剧水和其他资源短缺，加速疾病蔓延，并可能刺激或加剧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虽然气候变化本身不能引发冲突，但是它可以充当动荡或冲突的催化剂，为世界上的民事和军事机构增加负担。报告强调，“气候变化将塑造美军的行动环境、角色和所承担的任务。国防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气候变化对其设施和军事能力的影响。”报告建议“制定应对气候和能源问题的战略方法”，并且详述了国防部的气候和能源战略的步骤。

在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包括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情报机构。除了美国国防部将气候安全置于战略高度外，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也开始采取行动。早在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就发布了名为《2030年前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Assessment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o 2030)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尽管美国将较少受影响，并且比大多数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甚至农业生产有可能出现效益增加，但基础设施维修和更换的代价将很高昂。该报告判断，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的最重要的影响主要来源于间接影响，即气候变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报告认为，2030年前气候变化本身不太可能触发任何国家的失败，但其影响将会恶化已有的问题，如贫穷、社会紧张的局势、环境退化、薄弱的政治制度等。此外，气候变化可能威胁到某些国家的国内稳定，造成国内冲突，但不太可能造成国家间的冲突。

此后，美国军方内部发出的“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的声音不绝于耳。30多位国家安全官员、国会议员和军事领导人与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一道在一封两党公开信上签名，促请国会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2012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也公开表示：“在21世纪，我们认识到气候变化能够影响国家安全——从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到严重的干旱、极地的融化乃至更加频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都提高了对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援助的需求。”

美国气候安全的政策或机制保障刚刚起步

美国不仅在战略文件《国家安全战略》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开始考虑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而且开始制定并实施详细的政策和措施，来保障美国的气候安全。

首先，美国军方开始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1990年代，中央情报局（CIA）曾设立环境中心，但小布什政府上台执政后，该中心被另一个办公室合并，与气候相关的工作由此被忽视了。2009年9月，在中央情报局局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的支持下，中央情报局设立了一个气候变化和国家安全中心（Center on 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该机构重点关注气候变化的结果（如荒漠化、海平面上升、人口迁徙、自然资源竞争加剧等）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目的是为美国决策者谈判、实施和核证涉及环境问题的国际协定提供支持。但是，2012年初，由于美国情报机构的预算缩减，中情局悄悄关闭了这一中心。美国国防部也开始创建新的机构来应对气候安全问题。2009年5月，海军作战部部长创建了一个海军气候变化工作组（Navy Task Force Climate Change），来应对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其次，美国军方开始和技术层面针对气候变化的可能后果制定应对方案。2011年3月，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CEQ）发布了《联邦机构气候变化适应规划实施说明》（Federal Agency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ning Implementing Instructions），要求每个联邦机构“评价（本）机构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和脆弱性，以便管理气候变化短期和长期内对该机构的行动和使命的影响”。2013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新的《气候变化适应路线图》（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oadmap），目的是在国家安全的大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全球性影响（如地缘政治后果、冲突加速，以及对食物、水和其他维持生命的资源的竞争），也包括人道主义救济所引发的国防部对资源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第三，美国审计总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也发布报告，建议美国政府通过更好地管理气候变化风险来减小其财政风险。2013年，美国审计总署首次将气候变化编入其定期发布的“高风险名单”，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焦点问题，给许多环境和经济领域都带来了风险，包括农业、基础设施、生态系统以及人类健康等等。不但如此，它还给联邦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风险。”报告指出，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领域包括政府拥有的大量基础设施、军事基地、国家洪水保险计划投保的财产、向自然灾害受害者提供的援助等等。美国审计总署还建议，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采用所有政府部门参与的战略方法来管理相关的风险。

最后，财政支出的多少最能体现美国对待一个具体问题的态度。然而，确定联邦政府各个机构花费在气候变化上的资金数额非常困难，更别说将气候安全资金与用于气候变化的资金区分开了。在这种情况下，考察气候安全相关研究的经费支持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研究表明，美国非政府组织对有关气候安全问题的研究的资助增长迅速，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有限。2000年至2008年，受到资助的气候变化研究项目数量翻倍，资助总额从不到1亿美元增长到超过9亿美元。其中，来自大型资助者（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休利特基金会和能源基金会）的资助占预算总额的比重相对较少。也就是说，大型资助者的大量资金尚未投入到气候安全问题的研究中。目前，只有少数资助者将“气候安全”确定为其资助的重点领域之一。

美国民众对气候安全的认可度

美国军方的努力和倡议是否有可能为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定下基调？这需要考察美国公众对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的认识与支持。目前，美国已受到气候变化的危害，特别是在2012年，纽约城遭遇洪水泛滥，中西部地区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当年夏季，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森林大火，气温也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的新高。上述各种自然灾害给美国造成了重大损失。

根据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研究，2012年，自然灾害在全球范围内共造成1600亿美元（约合1200亿欧元）的损失。由于飓风“桑迪”和夏季大旱灾，美国占全部损失的比例非常高，67%的损失与美国有关。在650亿的保险损失中，美国甚至占到90%。飓风“桑迪”于2012年10月29日晚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附近登陆，随后横扫整个东部海岸。风暴潮袭击了几百公里长的海岸线，5000多万美国人的生活深受其影响。据估计，这场超级飓风给美国带来了300亿至500亿美元的损失。此外，据慕尼黑再保险有限公司称，在被称为美国粮仓的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的中西部地区发生的干旱，造成了美国农业保险史上最大的损失。由于农作物歉收，美国农业2012年遭受了约200亿美元的损失，而以往一年的损失通常在90亿美元左右。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f Climate Change, IPCC）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变暖将增加洪水、飓风、极端高温事件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真实的自然灾害及其严重后果是否会影响美国公众的政策倾向，进而促成新的气候解决方案的出台。2013年3月2日至5月1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全球39个国家对37653

名受访者展开了名为“本国面临的安全威胁”的调查(见表1)。结果显示,在全球层面,多数被调查国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是本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其中,对全球气候变化最为关注的地区是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亚太地区和欧洲。按国别来说,黎巴嫩、突尼斯和加拿大认为气候变化是本国面临的最重大的威胁。

当多国居民纷纷将气候变化认定为本国面临的重大威胁时,美国人对全球气候变化仍然相对而言漠不关心。调查显示,在39个被调查国家的受访者中,美国人对气候变化威胁本国安全的认同度最低,仅有40%的美国人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对气候威胁本国安全认同度较低的国家还有中国、捷克共和国、约旦、以色列、埃及和巴基斯坦。美国人认为,美国面临的威胁排名前三的是朝鲜核计划(59%)、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56%)和伊朗核计划(54%)。上述民调结果说明,气候问题“安全化”在美国的舆论基础仍然十分薄弱。

表1 关于“当前世界所面临主要威胁”的民意测验结果(%)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中东	亚太	拉美	非洲	世界
全球气候变化	40	54	54	42	56	65	54	54
国际金融不稳定性	52	45	63	54	49	49	54	52
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56	41	55	41	47	31	56	49
朝鲜核计划	54	44	56	41	44	39	41	44
伊朗核计划	59	47	52	17	46	38	39	42
美国实力和影响	23	23	20	36	42	33	21	27
中国实力和影响	44	34	38	17	29	23	26	27
巴基斯坦政治不稳定性	37	22	31	9	24	20	25	22

资料来源: 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Climate Change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 Seen as Top Global Threats, June 24, 2013, <http://www.pewglobal.org/2013/06/24/climate-change-and-financial-instability-seen-as-top-global-threats/>

所谓“安全化”,就是将非安全事务上升为安全事务的过程。气候问题被安全化的实质,意味着美国可以通过非常规手段来动员全国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然而,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学术界和智库的相关研究已具有较好的基础,但美国当前的行动并没有超出政治程序的正常限度,且部分行动因缺乏财政支持而半途而废。可见,美国国内的气候问题安全化的进展仍然十分有限。《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

影响》研究报告中的一些结论虽然只是“推断性观点”(speculative claims) 或“推断”(speculation), 但它们最大的意义在于其警示效应, 即促使决策者将气候变化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但是, 美国决策层内部的质疑以及美国民众的认识不足, 阻碍着美国决策层超越常规法制和社会规则做出反应。

(赵行姝 :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6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与美国所创新工程“美国综合国力变化与国际比较”子项目组联合主办的题为“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美国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该创新项目组首席研究员袁征主持了会议。与会者围绕网络安全与中美关系、我国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及斯诺登事件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傅梦孜副院长认为，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网络安全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中国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另外，当前全球不同的国家和行为体都通过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性的紧密连接，因此美国必须要掌控网络。在他看来，美国的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 维护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2. 通过网络战或对网络的支配达成其它的国家目标，主要是通过军事、经济和科技间谍进行信息搜集，削弱对手，限制其经济发展，打击其动员能力，同时进行和平演变；3. 美国如果控制了经济发展最快、网民增长最多、经济力量日益接近美国的新兴经济体，就等于控制了网络政治的中心地带，控制了网络世界，进而就能够支配世界；4. 实现其它的国家目标，如反恐；5. 美国担心别国会通过网络算计它，所以加以防范。总之，美国提出网络安全议题的背景和动机很复杂，美国自身想支配网络，但它的控制能力离此目标还有差距。

外交学院的李海东教授认为，应该从大战略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的做法。首先，用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的思路来看，美国是在用间接的方法让中国处于被动之中。其次，网络安全问题涉及到国际体系的转型，对今后全球公域规则的构建来说是一个重要议题。因此，美国会不遗余力地打造包括网络在内的全球公域的规则。再者，网络安全涉及多方面的的议题，其核心是经济领域中的网络安全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议题，因此带有综合性，对一个国家的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美国把网络安全问题设置成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想通过议题设置来引导中美关系的走向。最后，网络安全问题涉及到真正的硬安全，因此美国建立了网络司令部，且其人数正在急剧扩编。这也提醒

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领域中的网络安全,而且在军事安全领域也应尽快加强相关建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徐龙第副研究员认为,美国提出网络安全议题的动机主要包括:1.美国受到的网络攻击越来越多,这种客观现实促使美国更加重视网络安全问题。2.美国的网络技术比较先进,它想在这方面压制别的国家。3.美国想引领网络领域国际规则的制订。4.随着美国削减军费开支,美国有关各方都想借助网络安全问题争取军费。5.对中美关系来说,美国是想通过提出网络安全议题来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的。他认为中美可以围绕以下问题进行对话:探讨和厘清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等相关的概念问题;磋商打击网络犯罪和保护知识产权等具体问题;坚持进行多层次、多主体的交流。对于斯诺登事件,他认为,斯诺登事件本身就是美国价值理念的产物,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美国的一些网络安全立法可能会因此受阻。这一事件也使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比较平衡的态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张明副研究员介绍了其所在单位与美国战略研究中心进行的双轨对话的情况。他指出,美国政府在有意推动网络安全议题,目的是要诋毁中国的网络形象,给中国制造一个黑客国家的形象,为自己建设网军等寻找借口,并逼迫中国做出反应。对于中美在网络空间问题上的争议,他认为,美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关切具有一贯性,首先是关注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其次是网络经济间谍行为,即知识产权保护;再次是网络犯罪问题、网络自由问题,以及个人隐私保护等。美国现在最关注的是网络经济间谍行为。中美在网络问题上的主要争议领域是:1.网络空间行为规范的制订问题。2.国际法在互联网中的适用问题,主要是传统的武装冲突法是否适用于网络空间的问题。3.网络空间的军事化问题。4.国际机构在互联网空间中的作用问题。

美国研究所张国庆副研究员指出,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凸显出了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的网络战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面:1.进行网络战,其主要的假想敌是中国和俄罗斯。2.进行反恐,打击犯罪。3.维护商业安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4.进行情报搜集,利用它在互联网上的优势搜集各类情报。5.进行文化渗透。在他看来,中国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加强网络安全立法,形成网络立法的体系,然后通过案例进行补充。2.建立自己的网络安全战略。3.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都要加强网络安全意识。4.对于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博弈,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团队去做相关的工作。5.在网络话语权问题上,不能让美国一家独大。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陈训逊处长指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

正在加强对中国的防范，美国逐步在中国互联网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上加装监视系统，在网络上对中国形成包围，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严重威胁。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可信计算与信息保障实验室的苏璞睿副主任分析了中国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他指出，斯诺登事件的发生验证了我们以前的一些猜想，即美国的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与美国政府存在某些先前不为人知的合作。斯诺登事件所带来的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美国以软件漏洞为形式的后门以后仍会广泛存在。2.斯诺登事件揭示出美国的流量监控能力，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加密手段对数据流进行保护，但对于美国破译密码的能力我们目前还很难评估。3.关于数据分析问题，美国对大数据的分析能力令人担心。他认为，斯诺登事件发生后，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对全国人民（包括各级政府官员）进行一次网络安全教育，并推动我国信息产品的自主化。其次，对于真正涉及国家安全的网络资源，我们应该逐步建立一个保障的体系，实行有效的管理。最后，在技术上，我们要努力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通过创新开发自己的替代产品。

（何维保 供稿）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其影响” 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7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美国所创新工程“美国全球战略及其调整”子项目组和“美国对华战略发展趋势”子项目组承办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澳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等单位的十余位学者与会。会议就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的成果及影响展开了研讨。

一、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滕建群研究员认为，中美两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稳定中美关系的战略意图比其第一任期更为突出，注重加强与中国高层的良性互动。中美双方都有加强联系的迫切

愿望，均希望通过高层交往打消对彼此存在的战略疑虑。两国领导人的庄园会晤以及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就体现了双方的这种意愿。第二个特点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军事与外交并重的策略，军事部署基本到位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力度较大的外交措施，并产生了一定的附带效应，促使有关国家的对华态度及政策开始发生转向。第三个特点是美国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投入力度，中南半岛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重点经营的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处理与该地区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的复杂程度。关于此后美国对外战略的走向，他认为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美国外交开始向欧洲和中东地区回摆，但重心依然在亚太地区。美国这一外交回摆与欧洲地区的发展状况及新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等人的中东情结有关，而奥巴马总统也想在中东问题上有所作为，留下自己的外交遗产。关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他认为中美双方都应该加强危机管控。鉴于奥巴马第一任期内中美之间战略互疑增加，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有利于说服美国，增加相互信任。中美之间有必要确立彼此的利益界线，进而达成一种默契。此外，为了打破美方的纠缠和防范，还应注重建立新型的周边关系，加强对中美关系中第三方因素的管控。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钱立伟研究员认为，此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相关团队的集体亮相，表明中美两国关系在双方领导层发生变化之后在加速推进。本轮对话中，中美双方承诺将在投资协定方面展开实质性谈判，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当年就加入世界贸易协定而展开的谈判，将使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一个新层面。这对中国的智力资源提出了挑战，需要中国方面及早应对。虽然中美之间相互竞争和防范，但是避免发生碰撞已成为共识。美方的主流观点认为，美方实际上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回应，这有利于中国在中美关系方面赢得一定的话语权。

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研究员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向国际社会及两国民众明确表明的一种态度。在国际局势和地区事务发展的这一关键时刻，两国有这么一个态度是非常必要的。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不好的发展势头，并在两国国内及世界范围内催生了一些联想，使得某些势力认为有机可乘。此时中美两国推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回应，本身就是一个成功，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在奥巴马出任总统以来，中美两国关系问题很多，变化很快，集中体现在两国对双方关系的定位的变化上。这段时期是中美两国关系定位变化最大的时期。中美两国是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定位突出了一个“新”字。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多维度的战略关系，而其核心维度就是要解决战略互疑的问题。中美之间如果能够在亚太地区达成一个战略妥协，则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基本可以实现。在发展中美关系方面，两国依然面临着一个机制创新问题，现有对话机制可能出现效用递减，更有效的对话机制亟待创建。本轮对话会议在很多方面有所创新，并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赵明昊研究员认为，此轮对话具有几个特点，即气氛良好，成果具体，在若干领域有重大进展，外部效应值得期待，隐忧不能忽视。此轮对话是两国新团队落实两国领导人庄园对话精神的首次接触，对话总体氛围良好。此轮对话对中国相关领域的智力支持提出更高的要求。开展全球发展对话和突出发展议题，与中美关系从内线向中线及外线的推进趋势是吻合的。中国方面应当善于把握和利用此前两国首脑会晤及此轮对话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妥善处理好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国稳定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意义重大，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适度推动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此轮对话的隐忧表现在，美国可能利用其与中国的接近和合作，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会产生一定的干扰；美国尚未开放其在人才、技术和能源方面的控制等。

美国研究所刁大明助理研究员认为，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内，美国内政方面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能造成影响。奥巴马此次是弱势连任，其推行国内政策的空间和力度有限。由于竞选中其外交政策所受非议较少，如果奥巴马总统考虑其政治遗产，外交不失为一个可以为之的领域。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的弱分立状态将会持续，国会介入中美关系的势头将会提升。此轮中美对话会议之后，美国将进入下一个选举周期，奥巴马的政策议程将会受到牵制。此外，美国内政变化将会使得中美关系遇到一定的干扰和挑战。

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对中美两国新领导集体上任之后的中美关系予以评估，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讲，首先中美关系的稳定性比较明显，美方对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较为看重。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内政问题，对其在第一任期内的外交政策不会再做重大调整。其次，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主要体现在中国方面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定位，美国方面也表示可以接受。尽管目前尚有诸多内容亟待充实，但这无疑为中国方面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此轮对话围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达成的91项具体对话成果，有助于中美两国在战略上达成更大的谅解，为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打下了基础。第三，中美关系出现了更大的包容性，两国尽力克服对彼此战略的零和思维。从消极的一面讲，首先，中美两国依然在诸多新旧领域存在战略竞争。在竞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制定共同的行为规则和准则以避免局部竞争转化为全面竞争，显得更为重要。其次，中美之间存在不对称性，中国在诸多领域处于不利地位。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使中国在话语权上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有助于中国主动去塑造美国。第三，中美关系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美国

国内政治走势还将对中美关系构成影响；中美管控分歧的难度在增大，尤其是管控第三方引起的分歧的难度较大；突发事件和美方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观望和判断，也是不确定因素。从这两个方面来判断，中美关系仍然是一个复杂的关系。

二、关于中美经贸关系与投资协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许宏强研究员认为，此轮对话在经贸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涉及中美经贸关系的诸多核心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中国同意与美国进行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该投资协定将对包括准入环节的投资的各个阶段提供国民待遇，并以“负面清单”模式为谈判的基础。中方的这一承诺表明了其在投资领域进行更大改革的决心，因此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将会改变以往的投资格局，使外来投资逐步向服务业和金融业转移。这对中国相关部门的监管能力构成了压力和挑战。尽管最终协议要经过数年谈判方能达成，但上海自由贸易区将会率先在这方面做出尝试和创新。从战略层面讲，此轮对话成果是在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内的区域经贸协定之外，为深化中美两国的经贸和投资关系所做出的努力。如果各项谈判最终取得相应成果，中美之间的经贸和投资关系将迈上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层面。

中国人民大学李巍副教授认为，本轮对话中关于经济方面的各项对话涉及领域广，在投资等领域又有所创新，是一次高水平的对话。鉴于目前中美之间在相互投资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对等性，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质疑：此类投资协定的最终确定会使对美国在中国投资的保护远远超过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保护。李巍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在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中，贸易问题尤其是顺差问题将逐渐淡化，投资的重要性将会愈发凸显。投资协定的谈判将会促进中美在其他经贸领域达成共识和开展合作。

美国研究所王荣军研究员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方面，美国习惯于使用“国家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及双边经贸发展方式做出判断。以此为标准，美方经常将中国已取得进步的一些方面视作后退，曾一度对中国的改革方向产生疑问。而此轮对话能够产生如此多的成果，与中方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有关，有助于坚定美方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虽然中方认为开放新的投资领域会成为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新阶段，但美国对此的热情还有待观察。此轮对话中美国做出的让步是承诺公平对待中国国有企业，尽管这一承诺还没有落到操作层面，但这一表态本身也是一种进步。综合而言，本轮对话中的行动规划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操作性。

三、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宣晓伟研究员认为,此轮对话将气候变化问题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将其看作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新支柱。气候变化领域的现实相关利益要多于意识形态色彩,这是一个双方合作空间较大且被寄予厚望、定位较高的领域。现阶段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作为还差强人意,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观念意识、利益考量和制度安排这三个层面。只有克服这三个层面的障碍,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才能深化。短时间内克服这些障碍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两国在这方面都需要加大推动力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王谋研究员认为,在中美关系中,气候变化问题的敏感性远不如其他主要问题,而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尚无较大作为,因此受到较大的国际舆论压力,这对中美双方都是一个促动。中美两国均是碳排放大国,美国一直想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之外的关于气候变化和能源变化的谈判。中美两国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将会被国际社会所关注。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将增加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但是中美双方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尽管中美双方在碳排放方面都有一定的空间,但在现实操作的层面却有相当大的难度,减排的潜力有限,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方面存在一定风险,在碳排放问题上还是竞争关系。美国是一个依赖技术突破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认为现阶段对减排的投入无需过大,一旦技术上有所突破,碳排放自然会减少。而中国现阶段在减排上所需的能源和资源投入,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来说是压力和挑战。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可能也会影响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两国都面临着一定的国际舆论压力,但是两国共同承担压力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中美双方在能源领域尤其是非常规油气领域进行合作的意愿和诚意还有待观察。

美国研究所何兴强副研究员介绍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和美国能源结构发生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美两国在非常规油气领域进行合作的前景。他认为美国页岩气革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目前在开发技术和产能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未来出口技术和产品的前景广阔。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及自身的页岩气储量,决定了它在进口和发展页岩气能源方面对美国存在产品和技术上的需求。目前美国向中国出口页岩气的最大障碍是美国相关法规的限制,以及美国页岩气出口基础设施改造方面的问题。美方承诺将在此领域克服现有束缚,这无疑将促进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最后,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分析了中美在气候变化及能源合作领域的中国国内因素,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已有共识且决心很大,并在官员考核和企业经营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国家意愿将会推

动和引导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做出相应的调整。事实也表明，在地方政府层面甚至民间层面，对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正在增加。所以，就中国方面而言，中国在这些领域进行变革的力度将会增强。从中美关系的角度而言，传统上影响中美关系的问题短期内彻底解决的可能性不大，中美两国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战略合作领域，以扩大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合作的战略性价值和意义将得到彰显。

(白玉广 供稿)

“叙利亚局势与大国博弈”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7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和美国所创新工程“美国综合国力变化与国际比较”子项目组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叙利亚局势与大国博弈”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防大学、解放军总参二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研究所、欧亚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的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美国研究所黄平所长致欢迎辞，美国外交室主任袁征研究员主持了会议。与会专家围绕当前的叙利亚局势及其走向、叙利亚与阿拉伯世界相关国家的关系、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大国博弈和美国的立场及中国的政策抉择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现将与会者观点汇总如下：

一、关于叙利亚问题的性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研究所殷罡研究员指出，黎凡特地区在历史上存在着各种深刻的矛盾。近代以来，殖民者故意挑起教派冲突，以实现以夷制夷的统治目的。历史表明各派系谁也不能彻底消灭谁，今天还是这种情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李国富研究员指出，叙利亚当前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社会对立，叙利亚问题折射出了中东地区各种力量的博弈和斗争的演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牛新春所长指出，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经常出现动荡局面，但主要是国家间的争斗。当前的叙利亚问题虽然牵涉到多方国际力量，但仍然是一个国内问题。

二、关于当前的叙利亚形势

解放军总参二部由健同志指出，当前的叙利亚局势还是政府军占优势。政府军意图通过消耗战来逐步消减反对派的力量，而反对派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灵活机

动，进退有据。所以，叙利亚的战局将会长期化，僵局化。李国富研究员指出，反对派武力推翻政府的可能性很小，政府军也不能将反对派彻底清除掉。因此，政府军和反对派的角力会长期化，常态化。

三、关于美国的立场和行动

殷刚研究员指出，美国不认为自己是个地中海国家，干预地中海事务的意愿较之过去大大降低。由健同志认为，美国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有可能向反对派提供重武器或者设立禁飞区。牛新春所长指出，如果出现人道主义灾难，或阿萨德政府完全控制局势，或基地分子在叙利亚占据上风，美国可能会军事干预。美国尤其不能容忍第三种情况发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唐永胜教授指出，保持适度的动荡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只有动荡的时候，才能凸显美国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郑羽研究员指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叙利亚无法跟伊拉克、阿富汗相提并论。美国从这两处都撤军了，应该也不会插手叙利亚事务太多。

四、关于俄罗斯的立场和行动

李国富研究员指出，俄罗斯是叙利亚的强力外援，对阿萨德政权的延续异常重要。牛新春研究员指出，俄罗斯和伊朗对阿萨德政府的支持是明确的。目前，俄罗斯依然能够发出强有力的军事信号，并传递给反对派及其西方支持者。由健同志指出，不排除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俄罗斯与西方达成交易，放弃对阿萨德政府的支持。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何维保博士指出，在目前阶段，美国没有筹码同俄罗斯进行交易，更何况俄罗斯不允许利比亚的情况在叙利亚重演。郑羽研究员指出，俄罗斯对美国利用别国内部矛盾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十分反感，普京甚至曾担心自己被推翻。叙利亚是俄罗斯在地中海仅存的战略支点。因此，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支持，一方面是出于政治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战略算计。

五、关于欧盟/北约的立场

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指出，当前，欧盟一心想把阿萨德赶下台，却没有为收拾之后的烂摊子做好准备。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也是个问题，故而出现了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而且，欧盟的立场显然受到美俄两国的影响。总之，欧盟意图通过非军事手段促使阿萨德下台，希望通过经济制裁促使叙利亚内部瓦解，希望阿盟和联合国介入调解并给出外交解决方案，同时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六、关于地区大国的立场

由健同志指出，叙利亚一旦崩溃，该地区的国家极有可能卷入由此导致的漩涡中。特别是伊朗作为叙利亚的最大外援，本身也受到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制裁，伊朗变局显然会影响叙利亚的局势。何维保博士指出，以色列是叙利亚的死敌，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很成功。以色列的立场将对叙利亚的走势构成影响。李国富研究员指出，以色列对叙利亚进行的军事打击引起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警觉。此外，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战略东移政策心怀不满。

七、叙利亚局势的未来走势

叙利亚的形势已经陷入僵局，政府军和反对派都无法打破这种平衡局面，它们各自的外部支持力量也都无力或无意深度介入。这种僵持局面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不过，由健同志也指出了一种可能的走向，即叙利亚反对派可能最终取胜。总之，叙利亚局势的走向不仅牵涉大国的利益判断，也在拷问国际社会的公共道德。大国除了浑水摸鱼、在乱局中推进自身的国家利益之外，也肩负着恢复叙利亚国内秩序、稳定社会情绪的道义责任。

八、关于中国的政策选择

李国富研究员指出，我们要对自身的能力有清醒的认识，多争取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理解。殷刚研究员认为，中国应当审慎对待“西进战略”，不要重蹈往日帝国的覆辙。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参事时殷弘指出，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中国历史上处理西域事务的宝贵经验。在国际场合，我们不能拆俄罗斯的台，也不能害怕得罪西方，但要避免频繁得罪西方。唐永胜教授指出，在中东地区，美国做不成的事，我们也不要涉足。在道义上要积极参与到问题的解决进程当中，在具体问题上要适度灵活。郑羽研究员指出，在太平洋东岸，中国太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了，因此，在叙利亚问题上，我们要坚定支持俄罗斯。

(王玮 供稿)

“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政外交走向 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7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联合举行了《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3)——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

《美国蓝皮书》) 发布会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政外交走向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受邀莅会的来自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与美国研究所的学者一道,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战略关系、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评估、网络安全、美国人口种族构成的变化等议题入手,探讨了奥巴马第二任期的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现将主要研讨内容归纳如下:

一、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有学者认为,未来 1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会超过美国,这将影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我们要从新型大国关系的角度,并朝着这个方向,来解决中美关系中面临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没有意图挑战美国的地位。中美间的摩擦很多,但只要双方对两国关系有远见,就能够解决这些摩擦。中美关系很复杂,渗透到各自的内政中;反之,两国的内政又影响到中美关系,让中美相互成为对方的替罪羊。两国国内的问题如果解决好了,将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二、关于发展中美战略关系

有学者指出,目前已经到了重新界定中美关系的时刻。近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这对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产生着影响。目前,稳定中美关系的力量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经贸利益集团的传统稳定器的作用在下降,而经贸利益冲突的负面作用在凸显。此外,美国利用全球、地区机制约束中国的态势明显,对华规制主义日益强化。在涉及第三方因素的问题上,尤其是涉及领土争端时,美国的政策平衡日益难以维持。从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来看,双方相互疑虑成为普遍心态,中美对于两国关系的管控存在较大困难。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外交是一个普遍的政治现象,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影响中美关系,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民意也成为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战略互信。两国关系如果有战略基础,就能很好地发展;没有战略基础,就容易出现出问题。我们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想找到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目前中美关系的特征是,“三个 T”(即台湾、西藏和贸易)的老问题仍旧存在,新问题开始凸显。新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领域:1.地区主导权之争:亚太事务磋商机制虽有缓解,但不能解决问题;2.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步伐很快,美国对此深感疑虑;3.网络空间的竞争非常麻烦,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争端不断;4.中国的产业升级,使中美经贸关系特征和

性质发生变化，互补性降低，竞争性日增；5. 中国走向海洋，引起美国的警觉；6. 中国内政开始干扰中美关系，中国目前精英政治加民粹政治的形势导致内外政策上很难形成共识，这是中美双方都不愿看到的；7. 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凸显，这使中美经济竞争从事务性、偶发型变成制度性、经常型；8. 美国的不安全感加剧，影响了美国决策者的认知和判断，并通过大众传媒刺激了公众的脆弱神经。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加强中美经济依存，扩展中美社会的联系，挖掘中美文化的共性，加强两国在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合作，充分利用双边磋商机制。

对于中美战略互信问题，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中美缺乏战略互信是个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去追求互信，不要强求互信，也不要强调缺乏互信。两国根本的出路还是合作。如果两国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有一些合作，就会有一些互信。例如中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接触时，美国方面给中国交了底，就有了互信。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又有多少互信？例如美国与台湾是盟友，但台湾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毫不知情。

三、关于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就不久前结束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学者认为，尽管对话广受关注，但双方的关注并不一样。美方认为对话形式大于内容，过于空泛，我们则认为战略性不太够，比较遗憾。在一些具体领域，美国气势压人，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似乎成为对话中双方刻意回避的一个话题。它是奥巴马政府最为看重的经济问题，将塑造亚太经济。TPP 应该不能少了中国，但现实却是中国被排除在外。美国此前表示欢迎中国加入世界体系，但现在情况有些变化，美国对中国强大的国营企业有所顾忌。在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已发展成为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了。TPP 将中国排除在外，将使得充满活力的中美经贸关系受到影响。

四、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国内政策走向

美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和政策走向的很大影响。就目前美国经济的运行状况，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总体走势较好，就业、工业生产、贸易收支都表现良好，虽然财政赤字等问题仍很严峻，但总体上经济处于一种缓慢而稳健的复苏过程之中，而且这种趋势在下半年会持续。未来一两年中，美国将成为发达经济体中的领先者，对全球经济走向复苏有正面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面临艰难的国内政治局面，公众在政治上分裂，共和党控制国会众议院，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多数也没有达到 60 票的绝对多数，两

党在国会投票基本上以党派划线。在这样一种困难的形势下，奥巴马将面临四大任务：一是经济方面的财政赤字削减问题，以及自动减赤启动之后，如何实现各项国内议程。二是实施全民医保法。该法将于 2014 年全面付诸实施，届时联邦和州政府都面临如何实施的问题。三是如何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特别是在民主党的国会优势不在和面临财政困难的形势下，奥巴马是否会延续其第一任期的能源政策？四是必须全力在国会推动通过移民改革法案。奥巴马的两次当选都仰仗少数族裔的支持，因此，他必须全力通过移民改革法案。由于公众和国会都很分裂，完成这些紧迫的任务将会比较困难。

五、关于美国人口种族构成的变化及其影响

有学者指出，美国人口的种族结构有三方面的变化需要注意：其一，少数族裔的比重不断上升，预计在 2043 年将超过白人成为人口多数；其二，多种族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混血人口的增加反映了美国对跨种族婚姻的容忍；其三，少数族裔人口呈年轻化，在“千禧一代”中的比例已经达到 40%，预计到 2018 年将成为 18 岁以下人口中的多数。这些变化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影响，包括对美国的主流文化和社会认同产生广泛影响；对美国政治版图构成影响；对移民政策、政治选举等产生影响；影响美国的“人口红利”。另外，其它少数族裔的增加给非洲裔美国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导致许多工作机会被抢走，种族关系复杂化。

六、关于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

有学者指出，网络安全是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也是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庄园会晤和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这其中的原因有六个方面：一是美国在寻求网络世界的支配地位。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可以做成现实空间里做不成的事情，达到以往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达到的目标。二是美国有意用此来引导全球规则的制定。网络空间作为一个国际公域，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国际管理机制，所以，美国有意引领、制订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三是美国利用网络来进行渗透。从颜色革命到中东乱局，网络技术发达的美国都曾利用网络平台，在文化、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中国目前 5.9 亿互联网用户和 4.9 亿手机用户为美国进行网络渗透提供了很大方便。四是美国低估了中国在网络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快速发展，认定中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达到此成就的。五是美国指责我们所谓的黑客行动的最大目的是转移视线，为其进行网络战正名，而美国在网络方面的能力是首屈一指的。六是美国遭受的网络攻击正在增多，客观上需要防范，虽然它拿不到证据，但还是将矛头指向中国。新近出现的斯诺登事件使

得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内的道德制高点正在消失，让美国很尴尬，美国对中国的网络攻击也大白于天下。当然，中美在网络安全方面也有许多合作的空间。目前，美国掌握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核心，在互联网安全方面走在前面，我们在交流和沟通过程中可以经常借鉴美国的经验。两国在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等方面，都可以开展合作。

七、关于中美日三边关系

就中美日三边关系，有学者指出，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是利用并防备，对中国则是加强合作，保持打压。在三边外交中，中国对美国是加强合作，对日本则保持压力。日本安倍政权对美国的策略是“以接近换远离”，对华则是“以强硬换支持”。在三边互动中，中美关系最重要，双边关系的走向直接影响日本外交的方向；日美关系最稳定，具有联手对付中国的战略需要；中日关系最脆弱，相互都需要借助美国之力应对对方。这就使得美国的仲裁者角色日益取代了其“平衡手”的角色。相应的，日本也从沟通中美关系的桥梁变成了美国重返亚太的桥头堡。总之，美国的政策可以归结为威慑而不干涉，是一种积极旁观的模糊战略。

八、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有学者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进展、未来前景及其对华影响进行了评估，认为谈判进展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谈判密集，三年进行了17轮谈判，并且迅速扩容，从最初四个谈判伙伴变为现在的12国；其二是谈判内容广泛，涉及事项繁杂；其三是各谈判国的社会参与广泛，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都通过各种方式对谈判代表施加影响。关于美国推动谈判的原因，该学者指出，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也是在塑造面向21世纪的贸易规则，以及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强化联系。TPP未来面临的挑战是，谈判取得进展并不意味着会形成协议，谈判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将影响谈判的进程。谈判将对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果该伙伴关系计划得到充分发展，也会影响中国的贸易地位，对中国的贸易制度安排构成冲击，限制中国的地区影响。

（何兴强 王玮 供稿）

美国战略要闻

(2013年5-7月)

- 5月22日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安曼出席“叙利亚之友”11国部长级会议。克里表示，奥巴马总统无意派遣美国军队到叙利亚，但会以其它的方式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克里称，奥巴马政府“在有关如何提供这种支持以及何种支持的问题上不排除任何方案”。如果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努力失败，那么“叙利亚之友”将继续支持反对派为争取叙利亚的“自由”而战。
- 5月23日 奥巴马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讲话，阐述美国的反恐战略。他指出，美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对新形势和新威胁应当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对付盘踞在阿富汗、也门等地的基地组织成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无人机轰炸。奥巴马称，通过对恐怖分子采取有的放矢的行动、发展有效力的伙伴关系、加强外交接触和援助，美国能够大大减少针对美国本土的大规模攻击发生的机率，并能减轻海外的美国人所面临的威胁。奥巴马在讲话中还再度提到了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计划。
- 5月24日 奥巴马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称尽管面临严峻的财政困难，美国也要保证让军队得到为应对挑战所需的费用和装备，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建立一支拥有超越下一个十年各国海军实力总和的舰队的计划。
- 5月26日 克里在安曼参加“2013年中东北非世界经济论坛”，在论坛上宣布了一项旨在振兴巴勒斯坦经济的总额达4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 5月27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就即将举行的中美首脑会晤深入交换意见，并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
- 5月28日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西班牙港会见来自加勒比地区的15个国家的总统、总理和部长，讨论美国深化经济合作、扩大该地区繁荣的承诺，以及民事安全合作和建设有利于商业和投资的安全社区的重要性。拜登和加勒比共同体主席、海地总统马特利分别代表美国和加勒比共同体15国签署了“美国-加勒比共同体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
- 5月30日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2012年恐怖主义问题国别报告”(2012

Country Report on Terrorism) , 内容包括对恐怖主义的战略评估、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支持恐怖主义和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的国家、外国恐怖组织等。报告称,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更分散,地理分布更广,美国“必须提高合作伙伴的能力,抗击继续在世界各地煽动恐怖主义暴力的意识形态”。

5月31日 奥巴马在白宫与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举行会谈,双方主要讨论了阿富汗局势,探讨了2014年美国 and 北约撤出大部分作战部队后,应当采取何种措施继续确保阿富汗安全部队能够有效地控制边境和避免阿富汗今后成为恐怖活动基地等问题。两人还讨论了改进北约防卫能力,以应对新挑战和利比亚局势等问题。

6月1日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国将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空中、地面力量和高科技武器,以落实在本地区的“战略再平衡”部署。哈格尔重申美国将坚持上届对话会上宣布的到2020年前将60%的海军军舰部署到太平洋地区的计划,并称在此基础上,美国还将把其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他表示,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具建设性的关系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6月2日 美国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丹尼尔·贝尔(Daniel Baer)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谈及《2002年西藏政策法》的实施情况,称美国的目标是“促进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实质性对话,并帮助延续西藏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文化遗产”。

6月3日 奥巴马发布行政命令,授权对从事或为大量买进、卖出伊朗里亚尔交易提供便利或在伊朗境外保持里亚尔账户的金融机构实施制裁。

6月5日 奥巴马宣布任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Susan Rice)担任总统国家安全助理,接替将于7月初辞职的多尼隆。奥巴马还提名前总统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多边和人权事务的高级主任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为常驻联合国代表,接替赖斯。

克里国务卿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印度、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南非、斯里兰卡、土耳其和中国台湾大量减少了从伊朗的原油进口或达到了零进口,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将在180天内免受2012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45条的制裁。

北约国家国防部长会议在北约总部闭幕。会议确定北约2014年后将在阿富汗展开一项代号为“坚定支持”(“Resolute Support”)的非战斗行动。会议批准了这项行动的指导准则,今后数月内,北约军事专家

将按照这些准则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6月6日 《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和联邦调查局根据一项秘密计划，从美国9家著名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商那里提取音频、视频、照片、电子邮件和文件，以对使用互联网的个人进行追踪。该计划名为“棱镜”（PRISM），2007年开始建立，参与该计划的大公司有微软、雅虎、谷歌、脸谱、苹果等。同日，英国《卫报》网站取得的秘密法院命令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收集威瑞森（Verizon）通信公司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报道说，这份标示为“最高级别机密”的命令由美国联邦海外情报监听法庭发布，指示威瑞森商业网络服务公司在命令于2013年7月19日到期以前，“持续、每日”交出包括所有通话记录在内的电子资料。

中美第六轮战略安全与多边军控磋商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马朝旭与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与国际安全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罗斯·高特莫勒（Rose Gottemoeller）分别代表两国出席磋商会，双方就大国关系、地区热点、多边军控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6月7日 英国《卫报》报道，奥巴马于2012年10月发布了一项“最高级别机密”的总统政策命令，指示美国情报系统和国防部为“攻击性网络作用行动”（Offensive Cyber Effects Operations）制订计划，“提供唯一和非常规的能力，以极少警告或不警告对手或目标的方式和以造成从微妙到严重损害的效果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推进美国目标”。命令要求确定“具有重要意义的潜在目标”，称“攻击性网络作用行动”在这些目标方面可以提供与其他力量手段相比更能规避危险、获得显著效果的作用。

第十轮中美经济发展和改革论坛在华盛顿召开，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主持会议，中国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能源局副局长刘琦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

6月8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为期两天的会晤。双方同意不断加强两国在经贸、投资、能源、环境、人文、地方等领域务实合作，深化全方位利益交融格局；同意就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问题加强对话与合作。双方均强调了改善和发展两军关系的重要性，愿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设。中方将应邀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两国元首同意继续深化中美在多边机构内的合作，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进一步

加强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 (James Robert Clapper) 发表声明，称英国《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的美国政府进行的侦查行为是根据“对外情报侦查法”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进行的，是合法的，得到了国会的授权。该侦查行为旨在获得外国情报信息，挫败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恐怖袭击和网络攻击。

6月9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秘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表示，他是英国《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的“最高级别机密”的国家安全局计划的主要披露者，披露该计划是为了反对美国政府对无辜平民的系统侦查。

来自 19 个国家的 8000 多名军人在约旦参加美国主导的“热切之狮” (Eager Lion) 年度多国海陆空军演。演习旨在应对暴乱、边界安全等安全挑战。来自美国中央司令部辖区的 5000 余名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人及飞机、军舰参加了演习。

6月10日 《华盛顿邮报》-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56% 的美国公民表示，可以接受国家安全局为反恐跟踪对百万美国人进行电话记录监控，41% 的人表示反对。

美军与日本自卫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岛和彭德尔顿海军陆战队基地开展“离岛防卫”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投入“日向”号直升机航母和宙斯盾驱逐舰等主力舰艇，陆上自卫队则派出专门用于岛屿特种战的部队，参演兵力超过千人。美军方面仍以海军陆战队为主。

6月11日 奥巴马在白宫就移民问题发表讲话，称美国经济上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其人口构成。奥巴马列举了美国移民制度存在的问题，特别提到美国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到美国学习，当他们完成学业、获得发明或创业所需的训练时，美国的移民制度经常要求他们回国，这样其他国家就收获了好处。奥巴马称，这是不明智的，是移民制度存在的漏洞。

6月12日 美国“棱镜”计划揭秘者斯诺登在香港通过《南华早报》表示，美国情报部门早在 2009 年就开始监控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电脑系统。

6月13日 美国代理贸易代表梅里艾姆·萨皮罗 (Miriam Sapiro) 率美国跨部门代表团与东盟国家贸易部长和其他经济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主要讨论加强美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促进双方的就业和经济机会等问题。双方代表团研究了如何推进奥巴马和十位东盟领导人于 2012 年发起的“美国-东盟扩大经济合作倡议”(US-ASEAN Expanded

Economic Engagement Initiative) 的工作。

- 6月17日 奥巴马在北爱尔兰厄恩湖八国集团峰会期间宣布，美国向受叙利亚冲突影响的叙利亚人追加提供3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用于救济叙利亚境内的人以及在叙利亚邻国的难民。同日，奥巴马与英国首相卡梅伦、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共同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谈判”。另外，他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讨论双边经贸关系、朝鲜和伊朗问题、叙利亚局势、反恐问题、核安全和防扩散等。双方发表了“关于加强双边接触的联合声明”、“关于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建立信任方面新的合作领域的联合声明”。
- 6月18日 美国和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正式向阿富汗安全部队移交主要安全职责，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和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出席了在喀布尔举行的移交仪式。美国防长哈格尔发表声明，表示祝贺。克里在美国国务院发布“2013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2013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报告评估了世界188个国家和地区打击人口贩运问题的情况。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等21国被列为表现最差的第三类国家，另有25个国家被列入第二类观察国名单。
- 6月19日 奥巴马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发表演讲，呼吁将全球战略核武器削减三分之一，承诺采取更多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他还表示，尽管美国对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保持警惕，但美国必须超越永久战争的心态。美国将努力关闭关塔纳摩监狱，严格控制使用像无人机那样的新技术，在寻求安全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国防部发布《美国核武器运用战略报告》(Report on Nuclear Employment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报告称，美国核武政策新的指导方针是维持可靠的威慑，有能力使任何潜在的对手确信，攻击美国及其盟国的不利后果远远超出他们可能通过攻击获取的任何潜在利益。报告称中国核武项目不够透明，其长期意图受到质疑，为了维持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稳定，美国支持就核武议题发起对话。
- 6月20日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提名人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出席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他表示上任后将推进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会做出两点调整，即进行“再再平衡”(rebalance within rebalance)和推动战略多元化。他指出，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更值得美国加大接触和介入，即进行“再再

平衡”。他认为军力等“硬实力”固然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石，但经济、能源、教育、价值观、民间交流、公共外交等才会产生重大和持久的影响，因此美国应兼顾上述领域，力争实现战略多元化。拉塞尔称，保护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和不受阻碍的合法贸易涉及美国利益，因此美国反对以胁迫、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实现索求。他表示，美国支持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展开协商，并制定解决争端的“行为准则”。

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温迪·舍曼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在华盛顿主持中美中东问题对话会。该对话是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设立的。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特别是叙利亚、伊朗和中东和平进程问题，探讨了推动双方在应对包括能源安全在内的地区问题和全球挑战方面进一步合作的途径。

6月21日 奥巴马致信国会领导人，称应约旦政府请求，“热切之狮”军演结束后，约700名美军及装备将留在约旦，其中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战斗机和相关的支持、指挥、控制和通讯人员及系统。这支部队将与约旦政府充分协调，直到安全局势不再需要他们留在那里。

迈克·弗罗曼(Mike Froman)宣誓就任美国贸易代表。

6月22日 香港《南华早报》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遭到美国间谍罪等指控的美国情报部门前雇员斯诺登向该报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入侵中国电信公司以获取手机短信信息，并持续攻击清华大学的主干网络以及电讯公司Pacnet香港总部的计算机。

克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由11个国家外长或外交大臣参加的“叙利亚之友”会议。会议同意向叙利亚境内反对派提供紧急援助，包括军事援助。

6月23日 美国“棱镜”计划揭秘者斯诺登离开香港抵达莫斯科。

克里国务卿在印度新德里发表演讲，阐述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克里表示，印度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伙伴，美国重视印度在确保亚洲稳定方面的作用。

6月24日 白宫发言人卡尼(Jay Carney)在记者会上表示，放走斯诺登不是香港移民官员所做的技术性决定，而是中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此举将给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奥巴马提名太平洋海军司令赛西尔·汉内(Cecil D. Haney)海军上将接替罗伯特·凯乐(C. Robert Kehler)空军上将，担任战略司令部司令。

克里在新德里出席年度美印战略对话。双方强调继续加强区域联系，通过区域对话机制强化美印关系。双方承诺继续通过双边和三边（美印日）形式就关系到该地区的问题密切磋商。

6月25日 奥巴马在乔治敦大学发表讲话，谈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他提出了有关降低美国碳排放和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准备的最新建议，称美国将领导和帮助其他国家向清洁能源过渡，为未来留下一个更洁净和更安全的地球。

6月27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移民改革法案。法案规定进一步加强美墨边境安全，并提出了使现在的美国非法移民13年后成为合法公民的路径。美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以东108公里的海域举行“海上战备训练合作”演习。

奥巴马在达喀尔与塞内加尔总统萨尔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的问题，美国承诺在基础建设、教育、农业发展、消除艾滋病和疟疾等方面帮助塞内加尔。双方同意加强两国年轻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6月28日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帕特里克·温特利尔（Patrick Ventrell）就中国新疆发生的暴力事件表示，美国对最近关于维吾尔族人和穆斯林在中国受到歧视和限制的报道深表关注，呼吁中国改变适得其反的政策，彻查这起暴力事件，保护中国公民的权利。

6月29日 奥巴马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发表演讲，赞扬年轻人在发展和民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宣布美国将设立华盛顿年轻非洲领导人奖学金（Washington Fellowship for Young African Leaders），从2014年起每年接受500名年轻的非洲领导人到美国接受领导力培训。

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一份从美国“棱镜”计划揭秘者斯诺登处获取的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欧盟总部、欧盟驻华盛顿外交使团和驻联合国的办事机构大楼进行监听，包括监听会议录音、人员谈话及电话通话，窃取电脑文件，监视电子邮件等。

6月30日 奥巴马在南非开普敦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美国将与非洲发展一种新型的重视非洲本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平等伙伴关系。他还承诺进一步扩大美非贸易，并宣布了美国的“非洲电力”计划（Power Africa）。该计划旨在将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电力供应增加一倍，美国将为此提供70亿美元的援助。

7月1日 奥巴马在达累斯萨拉姆与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促进双边经贸关系、非洲电力和基础设施发展、消除艾滋病、维护非

- 洲地区安全等问题。
- 7月2日 克里在文莱斯里巴加湾参加第20届东盟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克里呼吁各方停止通过强迫或挑衅行动推进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强烈敦促各方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管理和解决在南海的分歧。克里还就朝鲜核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阐述了美国的立场。
- 克里在文莱斯里巴加湾出席第三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称美国支持东亚峰会作为处理亚太地区政治和战略议题的主要机制。
- 7月8日 中美在战略安全对话框架下举行第一次网络工作组会议。双方就网络工作组机制建设、两国网络关系、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双边对话合作措施以及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
- 7月9日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框架下，第三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共同主持本次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洛克利尔（Samuel J. Locklear III）等参加。双方就共同关心的战略安全、综合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
- 7月11日 为期两天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闭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共同主持对话。双方围绕落实两国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共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进行了坦诚交流，取得了重要成果。双方积极评价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作用，并宣布建立元首特别代表热线。
- 7月12日 奥巴马总统签署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的法案。法案要求国务卿克里推动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在9月召开的蒙特利尔大会上批准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奥巴马表示，“美国全力支持台湾取得不要求以国家身份参与的国际组织的会员资格。”
- 美国与欧盟在华盛顿结束“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首轮谈判，初步确定该协定将涵盖市场准入、投资、服务、监管等20项议题，并定于2013年10月举行第二轮谈判。
- 7月17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重申了美联储对调整量化宽松政策的立场。他说，如果未来经济数据基本符合预期，美联储将于2013年早些时候开始削减量化宽松规模，并于2014年年中彻底结束资产购买操作。
- 7月18日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美国进步研究中心就美国亚太政策发表演讲，称美国加强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不仅是为了使该地区更

安全，也是为了使该地区更繁荣。

7月21日 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访问阿富汗，会见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邓福德。双方评估了阿富汗局势，讨论了美军的任务、将于2014年4月举行的阿富汗选举和2014年后美军在阿富汗的驻留等问题。

7月22日 中国外交部网站报道，7月3日，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西郊宾馆会见并宴请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及其家人。席间基辛格说，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如果两国吵架，世界就会分裂；如果两国能真诚合作，那么受益的不仅是两国，而是整个世界。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新任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其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称，奥巴马政府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方面不会后退，这一战略基于三个支柱：改进和提升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同盟关系；参与并投资地区组织；与地区新兴大国构建更好、更牢靠的关系。他把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的盟约关系称作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基础”，希望日本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

7月25日 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双方宣布建立两国间的“全面伙伴关系”，以推动两国在经贸、科技、防务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双方声明将努力在2013年底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同时讨论了南海和亚太其它区域存在的争端。奥巴马表示，他非常赞赏越南承诺通过东盟和东亚峰会机制确立行为准则，从而“和平和公正”地解决相关问题。

7月27日 奥巴马和哈格尔防长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朝鲜战争停战纪念活动。奥巴马表示，这场战争并非打成了平手，而是韩国打了胜仗，因为韩国人民现在生活在自由与民主当中，与朝鲜人民的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奥巴马称，朝鲜战争也给美国留下了教训，提醒美国不能仓促撤军，导致局势失衡。美国必需维持全球最强大的军力，确保盟友的安全。哈格尔表示，朝鲜战争让美国获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盟国和国际机构是美国影响力的“延伸”，而非对美国力量的制约，对美国维持和平与稳定这一长远愿景“至关重要”，尤其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是首位参加朝鲜战争停战纪念活动的在任美国总统。

(李晓岗 整理)

学术活动与交流

- 6月4日 黄平所长会见美国学者罗伯特·蒙代尔先生一行。
- 6月7日 黄平所长出席并主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信息情报研究院联合召开的战略圆桌会议。
- 6月11-14日 黄平所长赴美国华盛顿，出席中共中央党校和阿斯平战略所（Aspen Strategic Group）联合举办的中美学术论坛，并发表题为“中美在能源、环境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的演讲。
- 6月19日 黄平所长参加王伟光院长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活动。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教授罗伯特·罗格斯基（Robert Rogowsky）应邀到访美国所，作主题为“经贸外交与美国经贸决策模式”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黄平所长主持，刘尊副所长和美国所30余位科研人员与会。
- 挪威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nalysis, SISA）海尔格·卢拉斯（Helge Luras）研究员访问美国研究所，就中美战略关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反恐形势发表演讲。主持人？
- 6月21日 美国研究所“美国综合国力变化与国际比较”创新项目组首席研

研究员袁征率刘得手、刘卫东、黄河、王玮一行五人赴南京进行学术调研工作。

6月25日 瑞典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社会学会会长比约恩·维特罗克 (Bjorn Wittrock) 教授一行应邀到访美国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回应多元现代性”为题进行了学术报告。

报告会由黄平所长主持，来自美国所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研究生近40人聆听了报告。

黄平所长陪同李扬副院长会见瑞典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社会学会会长比约恩·维特罗克教授一行。

6月26日 由美国研究所主办的“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美国研究所的近20位专家学者莅会。袁征研究员主持会议。

6月27日 黄平所长参加我国领导人为基辛格90寿辰举办的招待会。

黄平所长陪同李捷副院长会见瑞典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社会学会会长比约恩·维特罗克教授；

7月2-11日 黄平所长陪同李扬副院长出访日内瓦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全法经济学会年会、英国学术院和伦敦经济学院，并与上述机构相关负责人和学者座谈。

- 7月17日 美国研究所举办“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和澳门大学的学者与会。黄平所长主持会议。
- 7月18日 美国哈德森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汪睿池先生到访美国研究所，就中美关系等议题与研究人员进行探讨。
- 7月20日 黄平所长参加并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港澳中心联合举办的主题为“2020 的中国与世界”的学术研讨会。
- 7月22日 美国研究所举办《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3）——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美国蓝皮书》）发布会，黄平所长主持会议。会后召开了题为“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政外交走向与中美关系”的研讨会，来自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研究所的学者参会。
- 7月24日 美国威尔逊中心主任、原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简·哈曼(Jane Harman)及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罗伯特·戴利(Robert Daley) 到访美国研究所，与研究人员就中美关系的相关问题进行交流。黄平所长主持座谈会。

(方锐华 徐子铭 整理)

